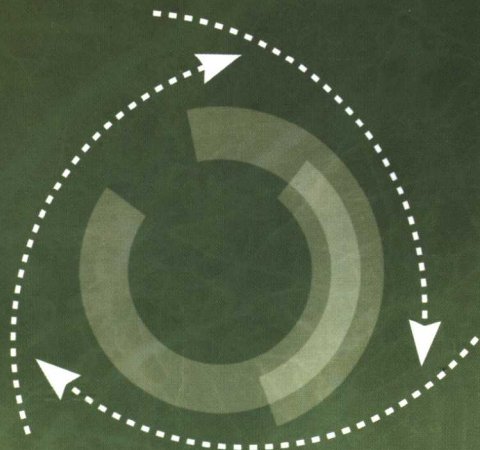


—QUANLI LINIAN WENHUA—

权力·理念·文化

——俄罗斯现行课程政策研究

张男星·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权力·理念·文化

——俄罗斯现行课程政策研究

张男星·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责任编辑 孙袁华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理念·文化: 俄罗斯现行课程政策研究/张男星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7
ISBN 7-5041-3662-X

I. 权... II. 张... III. 课程-教育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G5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3463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235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25 千

定 价 23.00 元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张男星，湖北松滋人，1967年出生，1992年在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98年评为副教授，200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2004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后证书，并于2004年评为教授。现就职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曾主研和主持国家级和省级教育科研课题多项。早年著有《口才口才口才》一书；近年来，出版专著《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变革》，参与冯绍雷、相蓝欣教授主编的5卷本“俄罗斯转型时代丛书”之《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的撰写等。此外，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比较教育研究》、《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著30余篇。目前主要进行图像时代与教育、教师教育以及比较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当前俄罗斯的课程政策从权力、理念、文化三个彼此相连的视点上进行了全面分析，分别探讨了“制定课程政策的主体”，“主体制定课程政策的追求”和“主体制定课程政策的追求之文化力量”。全书主要分为三篇。

上篇“谁主沉浮”，着重对俄罗斯现行课程政策得以制定所隐含的权力要素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对10世纪“罗斯受洗”开始的俄罗斯西方情结，进行了经历18世纪彼得一世的“全盘西化”、19世纪的“疏离西方”、20世纪苏联的“对立西方”、21世纪俄罗斯的“亲近西方”到“迎向西方”的梳理，阐释了由此形成的不同的课程政策，并借此说明俄罗斯课程政策的制定在实现一种转移：从亲西方的改革派政治权力对西方的迎合转移为传统派政治权力对传统的维护。

中篇“曲项向天歌”，着重对俄罗斯现行课程政策制定的理念，即课程政策所蕴涵的对俄罗斯教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意义进行分析，意欲说明在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教育资源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情况下，俄罗斯课程政策却表现出的一股重振俄罗斯教育、恢复俄罗斯世界教育大国地位的课程理念，而这映射出目前俄罗斯整个国家发展的价值选择。

下篇“天地在我心”，着重对俄罗斯课程政策所隐含的传统文化特性进行分析，意欲说明俄罗斯课程政策在受到外来文化，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影响下进行的课程改革，依然秉承了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并且课程政策主体也在努力将俄罗斯的过去和现在、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从而使课程政策在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同时，又频频与历史的传统相遇。

此外，本书为进一步说明俄罗斯课程在设置方面的变革，还将一些俄罗斯新开设课程及其课程标准附录在书后，可供读者深入了解。

序

张男星教授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权力·理念·文化——俄罗斯现行课程政策研究》，由教育科学出版社遴选出版，我由衷地为她高兴。本书的内容我是两年前读到的，那时，她是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分工联系的即将出站的博士后。

人生的许多事件看似偶然，却又仿佛真实地弥漫着一种必然。张男星是我即将离开南京师范大学奉派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进站的，她在博士后研究阶段走入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并与我一起进行有关俄罗斯教育方面的探讨，一方面缘于我内心那份由人生经历蕴积起来的俄罗斯情结，另一方面缘于她家学传承的那份为人做事的真诚和灵气。应该说，我和她之间进行思想与学术交流是有基础的。但当时忙于北京重新岗位的工作，我不能为她的研究提供更多帮助，只是为她的学习不断增加一些“对话”的质料而已。所以，这本由博士后出站报告修改、增补而成的专著，完全是她在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悉心教海的结果，尤其是在鲁洁教授多少次亲自指导下磨砺的结果。借此出版之际，我要特别向南京师大的教授，特别是鲁洁先生表示感谢和敬意！

我对本书所涉及的主题甚感兴趣。本书的主题是俄罗斯的课程政策及其改革。而课程改革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每个国家都在探索既适合世界发展趋势，又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课程改革思想、策略和路径，包括课程政策以及相应的课程目

标、课程计划等。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努力找寻自己的文化特点，并使课程改革能与之达成最大的适切性。本书以俄罗斯的课程政策为示例，将课程政策放置在课程权力、课程理念、课程文化三个维度的大框架内进行分析，把当权政治权力主体所代表的思想意识作为另类文化来看待，并认为它与传统文化一起影响着课程改革的理念和理念的具体化目标追求。这样的研究设计及其思路带动全书把权力与思想、政治与文化、传统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将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特点”来思考它们各自以及整合所发出的作用和影响。我认为，这样一种研究课程改革的思想和方法是新颖的，也是有价值的。

本书针对俄罗斯所进行的课程政策分析对我国课程改革具有反观借鉴意义；尤其在今天欧美话语十分流行的教育研究领域里，听一听来自俄罗斯的声音，也是极为有益的，毕竟我们与俄罗斯有着太多的联系和相似性。作为几十年来未曾离开过教育第一线的教育研究者，我始终认为，当今的教育研究一定要能影响政策、指向实践，不管是一般性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国别教育研究，目的都在于要为推动和改善中国的教育实践服务。记得在张男星作研究设计和开题时，我便建议她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到俄罗斯的课程政策上来，并要求和鼓励她不止于对俄罗斯教育的一般性研究，而更要能把俄罗斯教育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用到我们自己的教育中来，尤其是对我国课程政策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知道她目前正在着手一项“图像时代的学校人文教育”研究，希望她能继续挖掘俄罗斯学校课程中的文化要素以及人文内涵，以扩大和提升其研究的视野与质量。

特别令我高兴的、也是几年前完全无法预料到的是，最近几年中俄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极为迅速，本书的出版恰逢“中俄文化年”的启动。与普京总统访华拉开“俄罗斯年”序幕的同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由中俄两国著名教育学者参加的、中央教科所和俄罗斯教科院合作进行的“21世纪初期中俄教育改革比较研究”项目的国际研讨会。我们的研究被亲临会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赞誉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并且具有很大的可比性、互补性，这将对中俄两国教育的发展，对全人类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重要作

用”。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涉及 11 个教育领域的大型中俄教育比较研究项目中，张男星博士勤奋、专注而踏实地协助着我的工作，并出色地主持了这个项目的国际研讨会。我想，这些工作对她今后的研究和专业生活都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重要的锻炼。鉴此，本书也应当视为是她为中俄教育比较研究项目乃至“中俄文化年”做出的一份重要贡献。

朱小蔓

2006 年 3 月 27 日

奇怪于俄罗斯的“奇怪”

苏联，这个过去我们十分熟悉的国家，现在从国名到实体都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我们不够熟悉的拥有 89 个联邦主体的俄罗斯。俄罗斯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在进行制度和观念的变革，所以，人们把俄罗斯的改革称为巨大的社会转型。那么，作为与苏联全然不同的国家——俄罗斯，无论它转型的过程有多么艰难和复杂，其结果似乎都应对苏联的对立和反叛。苏联彻底消失了，我们也已然忘掉它了。

可是，当我们踏着对俄罗斯的好奇脚步，恍然于俄罗斯的巨变时，却从它那沸沸扬扬的改革中看到了许多“奇怪”：

——莫斯科的街头到处是麦当劳快餐店，而各地政府大楼乃至俄罗斯国家大剧院的幕布上却依然保留着“镰刀斧头红五星”的苏联国徽与党徽；与恢复和新建的宗教教堂在一起的那些原先的建筑，其大楼的壁画上还保留着“苏联建设时期”的内容；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电台开播必放的序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竟然是苏联时期对华广播必放的乐曲；高挂领袖相片的做法已经被风行的斜挂圣像所代替，但莫斯科著名的“卫国战争纪念馆”中依然挂着斯大林于 1941 年在红场检阅三军的大照片，各城市最多的历史人物雕塑仍然是列宁，而且在著名的红场上还矗立着马克思的巨型雕塑^①；邮局的营业窗口上还写着“苏联英雄、社会主义英雄、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和残疾人不用排队等候”的提示，其电报纸上仍印制着苏联国徽和“俄国邮电部”字样^②；

① 冯骥才著：《倾听俄罗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7 页。

② 子河著：“三色旗下的俄国——苏联解体十周年祭”，载《俄罗斯文艺》，2002（2）。

2003年11月27日，许多俄罗斯人穿着苏联红军的装扮，戴上红领巾，走上街头纪念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更为奇怪的是，俄罗斯的国歌是去掉歌词的苏联时期的国歌乐曲——作曲家格林卡的歌剧“伊万·苏萨宁”中的一段旋律，它的国旗是俄国时期的“三色旗”——一种被称为泛斯拉夫的白蓝红颜色，它的国徽是古老俄国从拜占庭帝国那里接受过来的“双头鹰”盾徽——红盾上一只金色的双头鹰，鹰头上是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鹰爪上是象征皇权的权杖和金球、胸部上是一只雕有白马勇士的小红盾……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觉得俄罗斯好“奇怪”。

而生活在这些“奇怪”中的俄罗斯人对这些“奇怪”的理解却非常“不奇怪”，他们平实地认为，这没什么，这是历史；他们的总统普京也明确地说，“历史是不容割断的，不能轻易地否定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举国上下这样的历史态度不由得使我们对正在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多了一分神秘，也添了一份渴望；它让人在想去了解俄罗斯沸腾现在的同时，也想去追溯那浩瀚的过去：“伏尔加河纤夫”脚步的沉重与艰难，“喀秋莎”歌声的深厚与昂扬，《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一切为了祖国、集体的心灵与精神，《静静的顿河》里对土地那母亲般的热爱和忧郁……那在历史中形成的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中成就的苏联，在历史中独立的俄罗斯，都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这没什么，这是历史”，反映的正是俄罗斯人对现实存在的价值观念。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所说：“社会已经比以前团结了，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看待历史的情况已成过去。”

于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在也把“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看待教育历史的情况”变为过去后，我们不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有着如此绵长历史的俄罗斯，一个如此尊重历史的俄罗斯，一个如此延续着历史的俄罗斯，一个如此把历史融入现实的俄罗斯，在必须跟上全球化步伐的今天，它的教育是否还留着乌申斯基、苏霍姆林斯基和马卡连柯的痕迹呢？

在教育领域观看俄罗斯

事实上，俄罗斯至少继承了苏联三样宝贵的“遗产”：第一，苏联的自然地理状况并未因为苏联解体而消失，其广袤的森林和草原使俄罗斯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土地资源，而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俄罗斯

文化（包括教育）也绝不会因苏联解体而消亡，俄罗斯独特的传统文化依然会以某种方式发挥着它对世界文明和俄罗斯文明进程的作用；第二，苏联用70年风雨建构起来的大国之躯——整个社会运作的物质设施、发展规模和水平，以及苏联免费教育所造就的社会运作的人文条件，也并未因为苏联解体而彻底摧毁，这使俄罗斯仍然拥有继续发展的强大基础；第三，这也是最为重要的，苏联把从沙皇俄国那里就已经形成的强国思想，即俄罗斯民族的“强国梦”继续留给了俄罗斯，这种大国情怀使俄罗斯不会屈从于一个二流国家的地位，而教育必然会是重整俄罗斯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著名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群魔》中早就这样确定过俄罗斯：“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扮演头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首要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然而，真理只有一个，因此在所有民族当中只有一个民族可以拥有真正的上帝，尽管其他民族也各自拥有自己独特而伟大的上帝。唯一‘体现了上帝旨意’的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

那么，一个如此傲气的、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角色的俄罗斯是如何承受和面对自1992年以来沦为“次要角色”的现实的呢？教育在这样的“承受和面对”中、在俄罗斯渴望扮演的角色中会怎样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式呢？专制制度、农奴制、村社思想以及东正教这些传统文化究竟会怎样影响俄罗斯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改革究竟是远离了自己的文化，还是走近了它？俄罗斯会如何对待自己的教育传统？俄罗斯教育改革又是如何处理迎向当今世界教育与维护自身传统发展逻辑的关系的？等等。这许许多多的问题是我们用教育的眼睛去观看俄罗斯的兴奋点，它诱使我们进行教育领域的俄罗斯研究。

从课程角度分析俄罗斯

在教育领域观看俄罗斯可以有許多角度：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的；教育体制的、教育模式的；教育理论的、学科教学的，等等。它们都可以从不同的切入点去认识俄罗斯教育。但一方面，我们无法在一篇论文里穷尽所有的视角，那样也显得凌乱；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所寻找的研究视角既属于俄罗斯教育变革的主干，以便能鸟瞰俄罗斯教育的重要变化和整体走向，同时又是目前世界教育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以突出

研究的时代性、可比性和借鉴性。于是,“课程”便从教育领域中跃然而出。

尽管,“课程”的概念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认为课程是一种知识主张的,有认为课程是达成集体目标的理性手段的,有认为课程是多元政治的交易产品的,有认为是社会主宰知识分配的主导利益表现形式的等,难以尽述。但我们认为,这些对课程含义的不同看法是属于研究性质的,它实际上并没有影响日常性质的传统课程观念在实践中的默认和广泛使用,即课程集中表达的就是教学内容及其目的、结构与顺序,体现为传统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或现在流行的课程标准以及教科书等;它是一切教育活动的最终落脚点并极大程度地决定了教育的有效性和意义性。

随着 20 世纪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在随之发生巨大的变革并给人类自身带来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影响,从而引发了人们重新思考知识对人、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由此,关涉知识的学校教学内容等课程问题也一直成为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而且最近几十年还备受教育研究者的关注。这一方面是源于课程自身发展的变化,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必然会引发教育与个体、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调整,进而引发课程内容、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方面的课程改革;另一方面是源于课程研究的变化,即课程论异军突起,从一个教学论的子要素变为囊括教育理念、教学目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方法、教学评价等众多指向的研究,并形成一种“大课程观”,从而大大扩展了课程研究的范围和实用性,而这两者的结合共同推动了课程改革与课程研究的力度和速度。

就此,如果以“大课程观”作为研究俄罗斯课程的全部对象,似乎仍然显得过于宽泛,因为要详细深入到每一门课程的具体内容中去进行俄罗斯课程的整体研究,那将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而非本书可以完成。况且,从俄罗斯社会转型研究的首要意义来讲,要把握俄罗斯课程,首先要问的不是某一门课程的具体变化,而是俄罗斯课程的整体变革;首先要了解的也不是每一门课程的细致内容,而是俄罗斯课程的总体偏向。所以,在俄罗斯社会巨变的背景下,研究总体大于研究细节,最起码,单个课程门类的研究在这里不是首要的重点和研究的主要方面。于是,“课程政策”便从课程领域中沓至而来。

以课程政策为主题研究俄罗斯

俄罗斯人自己断言,军事力量和智力潜力是俄罗斯发展的两大支柱。作为整个教育活动基础的课程正是智力潜力发展的重要场所和途径,因此,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等方面的规限便显示出课程政策对智力潜力这一俄罗斯国家发展支柱的作用。也就是说,从俄罗斯课程政策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命运和发展远景的认识,可以看到他们对世界进程和自身历史的认识,可以看到他们对吸纳外来文化和保存民族传统的认识,可以看到他们对国家、社会与人的关系的认识,等等。因此,本书对俄罗斯教育的分析仅围绕课程政策这一主题展开。

要论说课程政策,自然会牵涉出教育政策、公共政策、政策等这样的一些概念;所以,理解课程政策必须从认识政策开始。

“从一定意义上说,凡是由一定主体出发而对其他人产生影响的指令、限定均可称为政策。”^①我们在这里也主要从制定主体的角度来说明政策,而政策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组织)甚至是个人;据此,卡尔·弗雷德里奇认为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②而安德森进一步认为,政策主体分为官方主体和非官方主体,官方的政策制定者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行政管理人員和司法人員;非官方的政策制定者包括利益集团、政党和作为个人的公民。^③这就说明,政策包含了公共政策和非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便是安德森所说的由官方主体所制定的政策,特指由政府及其官员和机构所制定的政策,它是一个国家或社会政策整体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公共政策有如下特征:第一,由特定的主体,即由国家或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所制定及执行;第二,公共政策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要实现特定目标或目的;第三,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以及调整相关利益关系而采取的政治行动;第四,公共政策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④

① 王诗宗著,《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Carl J. Friedrich, *Man and His Govern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p. 79.

③ [美]詹姆斯·E. 安德森著,唐亮译,《公共决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4—45页。

④ 陈振明著,《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它是由政府及其机构和官员制定的，用以调整教育领域里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公共政策。根据美国学者佛兰德·S. 柯伯思的看法，教育政策除同样具有公共政策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第一，教育领域的权力比其他任何领域的权力都分散，教育政策不仅在不同的权力级别上形成和执行，而且在同一权力级别上也存在复杂的权力分配；第二，教育过程本身具有多种目标，在不同的教育机构中目标又具有含混性；第三，教育政策受到来自下层民众的关注最多，民众对教育系统更熟悉也更为关心，并积极参与教育活动的和学校的管理，等等。^① 实际上，教育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它要以有关人、社会、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观念为政策的出发点、目的和依据。

课程政策作为教育政策的一部分，体现为指向课程的一种公共政策。有关课程政策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台湾学者蔡清田认为，“课程政策是指有关课程目标的方针与课程方案的计划，以作为日后进行课程实施之方针”^②；艾尔摩和塞克斯认为课程政策可以界定为用来影响学校实然和应然教育内容的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指导方针；扑兰逊认为课程政策是一种权力的运用及控制，目的是维护和保持学校和社会某种理想的安排。^③ 从课程的含义及其与教育的关系而言，课程政策的特殊性应该在于：第一，课程政策是有关课程活动的行动准则、纲领和路线，解决较重大的并带有普遍性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手段、教育评价等教育教学问题；第二，课程政策是依据国家重要的教育政策在一系列的课程计划、学科课程标准、教学用书等方面进行变革的准则。所以，课程政策可以是一种对课程目的和具体策略的设计，用以解决课程体系所面临的政策问题和矛盾；也可以是一种对课程体系的价值选择，用以实现国家的某种教育理念；还可以是一种对课程资源的权力分配，用以维持或消解某种利益。于是结合这些看法，我们在此把课程政策定义为：带着一定政治认识的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部

① [美] 斯图亚特·S. 那格尔编著，《政策研究百科全书》，林明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42—443页。

② 转引自白月桥著，《素质教育课程构建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③ 谢少华著，《权力下放与课程政策变革——澳大利亚经验与启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43页。

门，在协调特定社会秩序的权力配置下制定的运行课程目标和方式的行动纲领与准则。而这些“行动纲领与准则”集中体现于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有关教育和课程方面的文件，同时还体现在杜马出台的涉及或直接关涉教育和课程的法律。正因为课程政策还散见于法律和教育政策中，所以，在许多时候课程政策本身就体现为一种教育政策，或者为教育政策所蕴涵；而教育政策一旦稳定下来为国家杜马所通过就表现为法律。因此，在研究课程政策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教育政策，有时两者还处于重合状态；同时法律文本也是重要凭证。

研究问题：俄罗斯的课程政策隐含着怎样的价值取向

从政策—公共政策—教育政策—课程政策的粗略认识中，我们可以把课程政策研究分为课程政策的制定研究和课程政策的实施（执行）研究两大类。艾尔摩和塞克斯就认为，课程政策包括作为意图指标的政策（表现为教育部层面的计划课程）和作为行动的课程政策（表现为学校层面的实际课程行动）。澳大利亚学者海因斯把教育政策研究分为“教育政策内容的研究”和“教育政策决策过程的研究”，前者属于静态性质的研究，后者属于动态性质的研究。^①而在课程政策制定的研究或意图指标的政策研究中还可以包含两大内容：课程政策的事实研究，即研究这个国家的课程政策是什么；以及课程政策的价值研究，即研究这个国家的课程政策为什么是这样。本书关于俄罗斯课程政策的研究偏向后者。

其实从政策的特点来看，它本身就内含着为实现特定目标所具有的特定价值取向；并且政策分析理论强调，政策分析的目的不仅要提供相关的“事实”，而且还要提供关于“价值”以及采取何种行为方面的知识。^②“价值观是决定政策或政策过程尤其是政策制定行为的主观概念，它对政策过程有极大的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目的可能反映了那些涉及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人的内心主观愿望和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③英国学者斯蒂芬·鲍尔就认为，政策明显是一件“对

① 谢少华著，《权力下放与课程政策变革——澳大利亚经验与启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38页。

② 陈振明著，《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③ 同上。

价值观进行权威性配置”的事情；政策是对价值观可操作性的表达，是“对法定意图的表述”；它与利益、冲突、专制、公正等要素是分不开的。^①而本书对俄罗斯课程政策的研究旨趣正在于通过课程政策的事实去认识俄罗斯人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在、传统和变革的态度，了解他们对教育、对人与国家发展关系的态度。所以，本书的研究指向于俄罗斯课程政策的制定，并着重对俄罗斯课程政策的制定进行价值取向分析，即把问题集中于俄罗斯课程政策中的价值观研究。

而“价值观”既是一个繁杂的事实问题，也是一个繁杂的研究问题。过去人们多从客体属性论、主体需要论和主客体关系论等视角去讨论价值，强调个体的属性对主体的意义；而今天人们则更偏重于从主体自身对事物的认识状态来理解价值，即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的观念，是人们对该类事物的价值取向取舍模式和指导主体行为的价值追求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把价值观理解为主体对事物的意义及其作用于自己行为的一种认识取向和态度偏好。由此，“课程政策的价值观”表达的就是课程政策主体对课程意义以及对课程发展实施某种措施的认识取向和态度偏好；它的研究内容包括课程政策理论、课程政策理想、课程意识形态、课程政策认知、课程政策情感和课程政策态度等。由于我们主要对俄罗斯课程政策的制定结果及其所形成的符号形态进行文本化的研究，基本不涉及课程政策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实践分析，并以课程政策制定主体为分析出发点；而且我们把课程政策主体所指为一种由国家领导人、政府和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国家立法机关以及一定社会力量等共同构成并统一作用于课程发展的活动者集合。^②所以，在本书里课程政策价值观表达的便是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组织机构对国家课程发展的理解、认识和行为上的取向，以显示政策主体的目的状态，属于一种群体价值观。于是，我们把俄罗斯课程政策价值观定位于课程政策事实中表现出来的政策主体对俄罗斯课

① [英] 斯蒂芬·鲍尔著，王玉秋、孙益译，《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因为俄罗斯联邦制是“总统联邦制”，由此形成了“大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权力格局，所以，总统和他领导下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对教育，包括课程政策制定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作用，因此在这里我们把国家领导人和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作为独立的课程主体分别提出。

程以及教育的认识态度和行为取向,包含对课程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理想追求、文化意识以及由此导引的课程实践规范;它显示了课程政策主体对课程及其与教育、人和国家发展关系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本书针对俄罗斯所要研究的问题。

研究要素:课程权力·课程理念·课程文化

库恩曾明确指出,科学领域的突破总是发生在研究范式变换的时候,即人们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世界的时候;这便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变换理论视角,还要从不同层次提出不同性质的问题。本书自然不敢奢谈去完成一种课程政策研究范式的变换,但也不愿将俄罗斯课程政策的研究或仅仅陷入国别性质的内容澄清式研究,或仅仅限于已有的课程政策研究框架,而不能提取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课程政策比较研究要素。所以,本书力图借助“俄罗斯”来对课程政策以及课程政策的研究表明一些“非俄罗斯”的什么。

截至成文之日,我们力所能及范围内看到的有关“课程政策”的研究非常少。其中直接在课题名称上出现“课程政策”字样的中文研究主要有三项,分别是台湾学者蔡清田的专著《课程政策决定》,大陆学者谢少华的专著《权力下放与课程政策变革——澳大利亚经验与启示》以及胡东芳的博士论文《课程政策研究——对“课程共有”的理论探索》。《课程政策决定》主要针对英国国定课程历史学科的课程改革来描述和分析课程政策决定的过程及其相关事项与影响因素,包括“以中央政府教育改革法案为依据的课程政策之规划途径”,“以国家文化认同为依据的课程政策变革”,“由上而下以教导为依据的课程政策之规划途径”,“以边陲系统为依据的课程政策推广”,“以科层体制为依据的课程政策评鉴”等课程政策决定的相关议题。《权力下放与课程政策变革——澳大利亚经验与启示》主要分析了西澳大利亚课程的权力下放问题所引起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相关方面的变化。《课程政策研究——对“课程共有”的理论探索》则主要围绕中央、地方、学校在课程管理上的权力问题进行分析。三项研究都涉及了课程政策中的课程权力,并主要指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这种行政权力分化;《课程政策决定》还论及了国家文化认同与课程政策的关系问题。

此外,一些学者、流派在论及政策、教育政策时也提出了自己关于